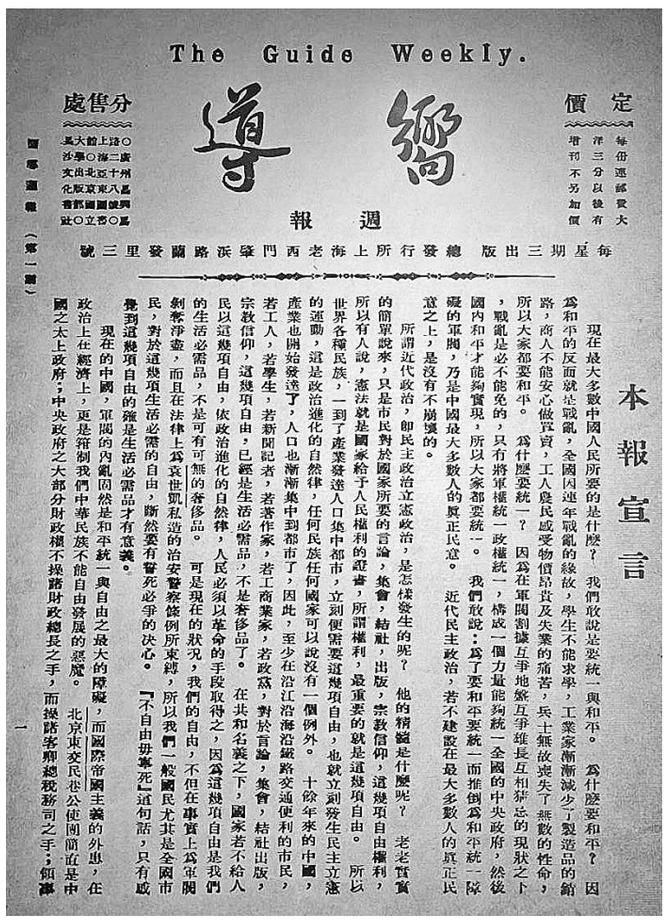
“黑暗的中国社会的一盏明灯”

——《向导》周报创刊纪事

何立波

在中国共产党报刊史上，最早的党报也是第一份中共中央机关报，当属1922年9月在上海创立的《向导》周报。《向导》周报经历了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建立和破裂，大革命兴起和失败的整个过程，历时近五年，成为大革命时期国内最有影响的刊物之一。

▲《向导》周报总发行处旧址照片，位于老西门兰发里3号(1960年前后)。



The Guide Weekly.

向導 週報

分處 定價

每星期三出版 總發行所 上海老西門肇浜路蘭發里三號

本報宣言

現在最大多數中國人民所要的是什麼？我們敢說是要統一與和平。爲什麼要和平？因爲和平的反面就是戰亂，全國因連年戰亂的緣故，學生不能求學，工業家漸漸減少了製造品的銷路，商人不能安心做買賣，工人農民感受物價昂貴及失業的痛苦，吳士無故喪失了無數的性命，所以大家都要和平。爲什麼要統一？因爲在軍閥割據互爭地盤互爭雄長互相猜忌的現狀之下，戰亂是必不能免的，只有將軍權統一，政權統一，構成一個力量能夠統一全國的中央政府，然後國內和平才能夠實現，所以大家都要統一。我們敢說：爲了要和平要統一而推倒爲和平統一障礙的軍閥，乃是中國最大多數人的真正民意。近代民主政治，若不建設在最大多數人的真正民意之上，是沒有不崩壞的。

所謂近代政治，即民主政治立憲政治，是怎樣發生的呢？他的精髓是什麼呢？老老實實的簡單說來，只是市民對於國家所要的言論，集會，結社，出版，崇教信仰，這幾項自由權利，所以有人說，憲法就是國家給予人民權利的證書，所謂權利，最重要的就是這幾項自由。所以世界各種民族，一到了產業發達人口集中都市，立刻便需要這幾項自由，也就立刻發生民主立憲的運動，這是政治進化的自然律，任何民族任何國家可以說沒有一個例外。十餘年來的中國，產業也開始發達了，人口也漸漸集中到都市了，因此，至少在沿江沿海沿鐵路交通便利的市民，若工人，若學生，若新聞記者，若著作家，若工商業家，若政客，對於言論，集會，結社出版，宗教信仰，這幾項自由，已經是生活必需品，不是奢侈品了。在共和名義之下，國家若不給人民以這幾項自由，依政治進化的自然律，人民必須以革命的手段取得之，因爲這幾項自由是我們的生活必需品，不是可有可無的奢侈品。可是現在的狀況，我們的自由，不但在事實上爲軍閥剝奪淨盡，而且在法律上爲袁世凱私造的治安警察條例所束縛，所以我們一般國民尤其是全國市民，對於這幾項生活必需的自由，斷然要有奮死必爭的決心。『不自由毋寧死』這句話，只有感覺到這幾項自由的確是生活必需品才有意義。

現在的中國，軍閥的內亂固然是和平統一與自由之最大的障礙，而國際帝國主義的外患，在政治上在經濟上，更是箝制我們中華民族不能自由發展的惡魔。北京東交民巷公使團簡直是中國之太上政府，中央政府之大部分財政權不操諸財政總長之手，而操諸客卿總稅務司之手；領事

共产国际支持，陈独秀筹办

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在上海成立后，十分重视报刊宣传工作。1922年8月的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西湖会议”，决定在北京创办《远东日报》，专门宣传国民革命。但共产国际代表马林认为，中共能力不足，当时也不应该办这样大的机关报，而且很容易引起敌人的注意，只应办一个周报。中共中央接受了马林的建议，决定创办《向导》周报，作为中央的政治机关报刊。中央还决定，由蔡和森担任主编，负责筹办工作。

在《向导》的创刊过程中，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长陈独秀高度重视，参与了《向导》筹办的具体工作。在《向导》出版前夕，陈独秀派李达去与挚友、亚东图书馆经理汪原放商量《向导》的排印方式，并书写了刊名“向导”二字，主持了《向导》办刊方针的制定，撰写《本刊宣言》。

1922年9月13日，《向导》周报在上海创刊，每星期三出版，十六开四版，以政论、时评为主。1923年，党中央对党团报刊进行分工，规定《新青年》季刊是“学理的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宣传机关”，《前锋》月刊是“中国及世界的政治经济的研究宣传机关”，《向导》是“国内外时事的批评宣传机关”。1923年11月，中共中央在一份报告中指出，在党所创办的《前锋》月刊、《新青年》季刊和《向导》周报三种刊物中，“《向导》在社会上稍有影响”。

《向导》周报经费非常困难，常以“本报启事”“敬告本报读者”的名义向社会各界特别是向读者进行“募捐”。一些党员干部也大力捐助。如中央执委高君宇便将自己生活费的大半拿出来作为报纸活动经费，而他自己却节衣缩食。与募捐相比，共产国际的经费是最主要的来源。1923年6月，陈独秀在党的“三大”报告中明确指出：“党的经费，几乎完全是我们从共产国际得到的。党员缴纳的党费很少。今年我们从共产国际得到的约有1.5万。”由于经费问题，《向导》在1924年之前的发行量没有增加。主编蔡和森曾向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和苏俄派驻国民党的政治顾问鲍罗廷反映过，但并未得到根本解决，每年仍只给200元左右。蔡和森感慨地说：“出版《向导》的全部问题，现在不在于政治上的镇压，因为现在中国没有一种力量，无论是帝国主义或是军阀，能够封闭《向导》，问题只在于经费。”

陈独秀和毛泽东极力“推销”

《向导》主要是通过邮局发行，也利用一些进步书店作为发行和零售渠道。上海书店、广州新青年社书店等书店，也都销售《向导》周报。为了加强对党报党刊的管理和指导，1923年10月，中共中央成立了教育宣传委员会，下设编辑部、函授部、通讯部、印行部、图书馆五部，印行部每月上报《向导》等报刊的发行收入情况。1924年5月，中央成立出版部，敦促各地注意扩展党报销路，寻找“不出费或廉价登《向导》广告之出版物”。

1924年9月25日，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长陈独秀和中央局秘书毛泽东联名签署了一则通知，直截了当地要求党组织、党员定购和推销《向导》：“凡属本党党员，不但有购阅本党中央机关报的义务，并有努力向党外推销的义务。”党中央还发动所有党员、团员推销党的刊物，并要求各支部书记担负起督促的责任，“每支部书记必使各党员订阅并担任推销，至少每人须购阅一份”，如果个人因经济困难不能购阅，还必须要经过支部会议的许可才行。

《向导》《中国青年》都印了可张贴的推销广告，党团员负责将其在各地张贴。中央组织部曾指示各地党组织：“为推销《向导》起见，中局已拟印一种颜色广告，不日可寄各地，各地接到此项广告时，应责成C.P.（共产党）、C.Y.（共青团）同志分送当地书铺、书摊，及前往各学校阅书室张贴，至要！”党中央要求各级组织和党员都要肩负起责任，并且规定了硬性任务，即每一个党员必须推销5份以上《向导》。同时，每一个支部还要负责推销3份以上的《新青年》和《中国工人》。到1926年7月北伐前夕，《向导》销量达到了5万份，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即使在江西赣州这样的内地小城，一个书铺每期能代售《向导》七八十份，《中国青年》五六十份。

首倡“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的口号

《向导》周报创办初期人员紧张，陈独秀、蔡和森、高君宇、瞿秋白、彭述之等领导人兼任编辑和主要撰稿人。陈独秀、蔡和森、瞿秋白、彭述之、李大钊、罗章龙、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张国焘、高君宇、郑超麟以及共产国际代表马林等，都为《向导》写过文章。陈、蔡、彭、瞿4位中央主要领导人，成为《向导》4位最主要的作者。

在《向导》创刊后，陆续开设了“时事短评”“中国一周”“世界一周”“读者之声”“各地通信”和“寸铁”等栏目。《向导》提倡朴实动人的文风，反对离开问题而谈主义，文章大都短小精悍，生动活泼，针砭时政，入木三分，具有很强的战斗力。一些标题很吸引人，如《吴佩孚真会拣择便宜货》《好个救国的妙计》《何东的狐狸尾巴现出来了!》《死不觉悟的外交系》《法西斯的祸水已经来了》《请看帝国主义的横暴》等，都让读者一目了然。

1926年《向导汇刊》第4集出版时，其广告词写道：“本报自4年前出版至今，一向便是全国最急(激)进的刊物。”干预彰显自己“最急(激)进”，显示出《向导》在大革命时期的巨大影响。《向导》大力宣扬“国民革命”，并赋予了它以新的含义，在大革命中发挥了唤起并团结民众的重大作用。《向导》首次提出“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的口号。“帝国主义”和“军阀”都是外来名词，一开始被人视为“海外奇谈”。《向导》坚持理论宣传不搞通俗化，“《向导》既然担起指导中国革命理论和策略的责任，自不能兼顾通俗化……”经过两年多持之以恒的宣传，《向导》终于使“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的口号深入人心，广为人知。

“纸老虎”的概念也是经《向导》的宣传而家喻户晓的。第一次国共合作前，国民党内存在着严重的恐帝思想，蔡和森认为这是“民族衰亡的预兆”，必须彻底揭露帝国主义外强中干的虚弱本质。1922年9月20日，蔡和森在《向导》第2期上发表《武力统一与联省自论——军阀专政与军阀割据》一文，用“纸老虎”一词来批评一些只知空发议论貌似强大的政治家或政论家。1924年10月，蔡和森在《向导》第88期发表《商团击败后广州政府的地位》一文，说英帝国主义支持的商团是“反革命的纸老虎，经十五日那一日的恶战便完全戳穿了”。《向导》还大力宣传孙中山的“三大政策”，使得它成为1927年最流行的口号。

读者投票选出的全国周刊第一名

《向导》周报是在租界的印刷厂秘密印刷发行的，多次遭到租界当局的查封。《向导》被迫不断迁移地址，并采取各种伪装手法，掩人耳目，以继续出版发行。1922年10月，《向导》在上海仅仅出版了四、五期的时候，租界工部局就查封了《向导》。

北洋政府对《向导》同样采取了封杀的态度，邮局常没收《向导》，借此削弱其社会影响。在北京办报时期，报社把印刷厂设在偏僻的小巷，并以承揽市民活计为掩护。他们还经常搬迁编辑部，来和敌人“周旋”“捉迷藏”。

1923年4月，《向导》随中共中央南迁广州，后又迁至杭州出版，不久又迁回上海英租界内的上海大学编辑出版。1927年4月，《向导》周报随党中央迁到武汉。7月15日，汪精卫叛变革命。7月18日，《向导》出版了最后一期——第201期。此后，《向导》周报宣布停刊。

《向导》周报在近5年的时间里，发行量最多时达10万余份，共出版了201期；刊发了国内外政论、时评700余篇，各地通信近120篇，各种文告宣言近60件，国内外读者来信110余件，总计320万字以上。《向导》是中国共产党早期报刊中持续最久、出版较正常的机关刊物，也是当时中国报刊界影响最大的刊物之一。1923年12月，在北京大学成立25周年纪念日举办的民意测验中，《向导》周报获得各界读者爱读票220票，名列全国周刊第一名。

读者赞扬《向导》的创办是中国“两千年来历史上破天荒的荣誉作业”，称赞《向导》是当时中国新闻界中“真敢替受压迫的工农阶级呼冤而确能指示民众以革命大路的”唯一报纸，把《向导》看作是“黑暗的中国社会的一盏明灯”。

（作者单位：北京师范大学文理学院历史系）

《夏衍日记》中的陈嘉庚

董立功

近日，笔者在阅读名人日记时，发现2016年出版的《夏衍日记》中曾数次提到爱国华侨领袖陈嘉庚。

夏衍和陈嘉庚二人籍贯不同，年龄也相差了26岁。1919年6月，当45岁的陈嘉庚返回家乡筹办厦门大学时，19岁的夏衍还只是浙江省立甲种工业学校的一名学生。二人之间最早产生交集，缘于我党在香港创办的一份报纸。

夏衍早年在日本留学，1927年夏回国后加入了中国共产党。20世纪40年代，夏衍曾两度赴港，第一次是1941年，第二次是1947年。1941年1月，正值皖南事变发生、蒋介石发动第二次反共高潮之际，周恩来急电夏衍赴港“避难”，并要他在香港建立一个针对海外华侨华人宣传的据点。4月8日，夏衍与范长江等人在香港创办了《华商报》。该报创刊后，因经费紧张，一度无法正常出刊。范长江想起他1940年曾经采访过专程回国慰劳的“南侨总会”主席陈嘉庚，便抱着试一试的态度写信向远在新加坡的陈嘉庚求助。陈嘉庚收信后立即汇去港币20万元，使《华商报》得以如期出刊，并成为香港宣传抗战的主要报纸。

1946年9月7日，陈嘉庚以“南侨总会”主席的名义致电美国总统杜鲁门、美国参众两院议长、美驻华特使马歇尔及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劝告美国应立即撤退驻华军队，停止对国民党政府的一切援助，以免重蹈日本企图分裂中国而自取败亡的覆辙。陈嘉庚此举显然激怒了国民党。为了消除陈嘉庚言论的“负面影响”，国民党利用自己控制的报刊对陈嘉庚进行了各种污蔑和抹黑，无所不用其极。就在国民党集团对陈嘉庚进行谩骂攻击之时，周恩来同志决定派夏衍前往新加坡，向陈嘉庚等爱国侨领转达中共中央对他们的关怀。

《夏衍日记》包括九个部分，其中第二部分为“新加坡日记”。据“新加坡日记”记载，夏衍是1947年3月4日深夜抵达新加坡的，是夜“船泊港外”。次日晨七时船开入港口，夏衍本以为能顺利办好入境手续，没想到“因三等（舱）有偷渡者，港口移民部刁难，不准登岸”。后来即使沈兹九、朱奇卓、林枫、唐瑜等友人来接，仍不能上岸。直到下午二时才登岸。3月5日，夏衍暂时住在广帮所建天一景酒楼。翌日下午搬至胡愈之寓所，“与阿朗、林枫同室”。

3月8日，夏衍终于见到了陈嘉庚，他在当天的日记里写道：

下午访陈嘉庚，谈一小时，他颇关心国内文化人安全。11时，访张楚琨。

陈嘉庚之所以非常关心国内文化人的安全，是因为就在1946年7月，爱国民主人士李公朴、闻一多在5天之内先后被国民党特务暗杀。国民党的文化专制主义不仅没有把大家吓倒，反而更加激起了文化界和思想界的义愤，也更加深刻地教育了人民。

夏衍在新加坡停留期间，不仅拜会了陈嘉庚、胡愈之、张楚琨等侨领，而且撰写了不少有关中共中央撤出延安后国内形势的时事述评。夏衍的活动很快引起了新加坡当局的“警觉”。1947年8月，夏衍被当局“礼送出境”，他抵达香港后继续从事统战工作。尽管夏衍在新加坡停留的时间不长，但却做了三件很重要的事：一是转达了党中央对陈嘉庚等爱国侨领的关怀，二是应邀出任《南侨日报》的主笔，三是为香港文化基金筹款。

1949年4月，夏衍被中共中央调回北平，准备接管上海事宜。陈嘉庚则于当年5月取道香港回国参加新政治协商会议。9月21日，陈嘉庚和夏衍一起出席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其中，陈嘉庚为主席团成员之一。之后数日，二人常在一起开会。9月24日，陈嘉庚和夏衍一起出席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第四次会议，夏衍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

下午3时正开四次会议。今日主席团陈嘉庚、高岗、史良、马叙伦、蔡廷锴。

由于夏衍日记的风格非常简洁，所以他并未在日记中记载陈嘉庚发言的具体内容。事实上，陈嘉庚当天作为“华侨民主人士首席代表”在大会上发言，并提出了7项提案。令陈嘉庚欣慰的是，他所提的七项提案全部为大会接受，并交中央人民政府处理。

（作者系集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

文人轶事 WENRENYISHI

鲁迅三写自传

周惠斌

鲁迅一生曾写过三篇简短的自传，尽管他曾说：“我是不写自传也不热心于别人给我作传的，因为一生太平凡……”(1936年5月8日致李霁野信)

1925年5月26日，俄译本《阿Q正传》将在苏联出版，鲁迅应小说的俄文译者王希礼(苏联人，原名波·阿·瓦西里耶夫)之请，特意写了《俄文译本〈阿Q正传〉序及著者自叙传略》。同年6月15日，该文在《语丝》周刊第31期发表，后来收进《集外集》。“著者自叙传略”可谓鲁迅的第一篇自传。

1930年5月16日，鲁迅写下《鲁迅自传》，文章未发表，后来收进《集外集拾遗补编》。这是鲁迅的第二篇自传，它是作者在1925年的《著者自叙传略》基础上增补修改而成的，主要从家庭状况、求学经过、工作简历、写作成果4个方面，记述了自1881年出生到1930年的经历和著述情况，反映了自己少年时因家庭变故，不得不过早地体验到人生的艰难和世情的冷暖。“自传”篇幅精悍，近千字的内容，选材精要、详略有致，只写生平、不加评论，寓内心情感于平淡的叙述中，高度概括了鲁迅大半生的不平凡岁月。因此，内容要比前文来得具体、丰富。

1934年3至4月，鲁迅应美国学者伊罗生之托，在编选中国现代短篇小说集《草鞋脚》时，写了第三篇自传，原文无标题，后来也被收进《集外集拾遗补编》。

比较鲁迅写的三篇自传，可以发现，作于1930年的《鲁迅自传》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一篇，虽然它的内容还未概述尽作者一生的经历，仍堪称自传体文章的典范之作。人民教育出版社一直将这篇自传选入七年级《语文》(下册)教材中，供教学使用。

文人轶事 WENRENYISHI

张恨水写抗战小说

王剑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张恨水开始从言情小说转向抗战小说。他不仅将正在《新闻报》上连载的长篇小说《太平花》中加进了抗日的内容，而且还创作出一系列的抗战小说——《东北四连长》《满城风雨》《巴山夜雨》《水浒新传》《巷战之夜》《大江东去》《鼓角之声》《八十一梦》等，计数百万字。张恨水在《弯弓集》自序中痛陈“寇氛日深，民无死所”，深感“心如火焚”，接着表明意图：“今国难临头，必兴语言，唤醒国人，略尽吾一点鼓励民气之意。”

在张恨水众多的抗战小说中，《热血之花》是他最早的抗战小说；《大江东去》是第一部描写南京大屠杀中日军所犯暴行的小说；《虎贲万岁》是第一部直接描写国民党正面战场——常德保卫战的“纪实作品”。

说起小说《虎贲万岁》，还有一段故事。1943年10月，国民党陆军74军57师师长余程万率部与6万日军展开激战，全师8000人最后仅剩83人。为了纪念这次战斗，余程万觉得有责任把这些壮烈事迹记录下来，便派人找到张恨水，极其诚恳地希望其能够办成此事。张恨水为他们的热忱所感动，更为57师虎贲将士的壮烈事迹所激励，决定将之写成小说。

1946年，《虎贲万岁》单行本出版。一时间，余程万和他的57师名扬中国。苏州一位很漂亮的小姐读罢此书，决心要嫁给张恨水笔下的“虎贲英雄”。此时抗战已经胜利，余程万的军队驻扎在南京。有一次，他去上海游玩，竟邂逅了这位苏州小姐。很快，这位叫吴冰的苏州小姐就嫁给余程万。

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向1000多人颁发了“抗战胜利”勋章，张恨水也名列其中。

文人轶事 WENRENYISHI

沈兼士诗赠陈垣

万庆东

七七事变后不久，日军占领了北平城。辅仁大学(后为北京师范大学)校长陈垣和文学院院长沈兼士认为沦陷区需要有一批人留下来主持正义，选择留下。

1938年，沈兼士在北平秘密组织成立研究顾炎武为名的“炎社”。他以顾炎武的名言“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号召沦陷区文教界人士参加抗战活动，激发师生爱国热情，协助流亡青年到后方参加抗日。

沈兼士在北平沦陷时期曾发表不少文章，文末落款注明成稿时间和地点时往往有“除日”“抗志斋”等字样，表示出鲜明的反日立场。他这种不畏强暴的民族气节，深深影响了与之交契深厚的陈垣。

北平沦陷时期，陈垣除了煞费苦心地维持着学校，与日伪周旋外。他潜心研究，一共写了《明季滇黔佛教考》等七部著作，阐发中国历史上的爱国主义传统，以此借古喻今，痛斥日寇侵略和汉奸卖国。

陈垣在给朋友的信中说：“北平沦陷后，北方士气萎靡，乃讲全谢山之学以振之……此时作品，以为报国之道止此矣。所著已刊者数十万言，言道、言僧、言史、言考据，皆托词，其实斥汉奸、斥日寇、责当政耳。”陈垣希望自己这些书可以激发知识分子要爱国，越到抗战后期，越要坚守民族气节。

读罢陈垣此时著作，作为好友的沈兼士慨然赋诗一首赠予陈垣：

吾党陈夫子，书城隐此身。
不知老将至，希古意弥真。
傲骨撑天地，奇文泣鬼神。
一编庄诵罢，风雨感情亲。

文人轶事 WENRENYISHI

梅兰芳为工人义演

王勇则

1952年，梅兰芳赴东北等地演出时，参观了不少焕然一新的工厂企业，为新中国建设的突飞猛进感到莫大鼓舞，也为工人阶级作出的巨大贡献深受感动。他决心组织一次全国巡回演出，专门为劳动人民献艺。

天津市第一工人文化宫当时新改造竣工不久，特请梅兰芳剧团于1953年春节后赴津，2月18日开演，演期初定11天（包括为抗美援朝伤病员加演一场）。梅兰芳决定为工人义演，其他演员只收演出费。梅兰芳深有感触地说：“工人同志们的热爱、鼓励，使我忘了疲劳。我的嗓音比去年长了一个调门。当我在表演时，唱到一个高音的腔调，或者做出一个比较深刻的表情、身段，观众一定很正确地报以热烈掌声。在剧情紧张的时候，台下则是肃静无声地细心领略。”这让他真切地感受到：“工人同志们的文化程度以及欣赏祖国古典艺术的水平也有了显著的提高。”年近六旬的梅兰芳场场都十分卖力。有的工人心疼地说：“《金山寺》的对枪、《霸王别姬》的舞剑，我们虽然看得过瘾，可是真怕他太吃力了。”有的工人还写来热情洋溢的信，或表示“今后我们保证以更高的工作热情来答复你为我们演出的好意”，或建议“表演一些对于宣传新婚姻法有意义的戏”。这些真情互动，让梅兰芳愈加感动，他马上与剧团商量调整剧目，新增《宇宙锋》等戏。

大艺术家专程组团为工人们演戏，轰动津门、场场爆满。很多路途太远和加班倒班的工人来不及买票，要求续演的呼声强烈，梅兰芳遂决定加演4天至3月4日。尽管如此，梅兰芳仍觉过意不去，他在署名文章《告别天津市工人同志》（《天津日报》1953年3月5日）中深情写道：“可惜这短短十几天当中，只有四万多位工人同志得到了座位，还有大部分没有看到我的演出。而我就要离开你们了，这是非常感到遗憾的事。我向你们道歉，将来有机会再见面吧！”

从3月15日起，梅兰芳带领剧团又马不停蹄地赶到石家庄演出。据《大公报》4月2日报道，梅兰芳“准备四月初在石家庄结束演出后，还要陆续到华东、西南、西北等地巡回演出”。

第二年年初，天津市第二工人文化宫正式建成，1954年1月15日，梅兰芳来津在开幕式上讲话时深情地说：“上次，我曾在第一工人文化宫为工人演出，这次又参加了第二工人文化宫的开幕演出。我还希望将来参加第3个、第4个以至第10个这样的演出。”梅兰芳对广大职工的尊敬既是发自内心的，也是至真至诚的。